

中 药 研 究

中药研究应注意了解药物兴衰史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郑 金 生

古代本草书中有记载的药物大约 3000 来种,而当
代常用药不超过三四百种,还有几乎十之八九的药物
被搁置,处于衰败状态。药物有各自的兴衰史,注意
了解药物的兴衰是很有意义的。明代李时珍指出,“天
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
常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例如香附子,虽见于《名医
别录》记载,但南北朝时一度“方药不复用”,而无识
者。数百年后,香附子大兴于世,成为妇科、气病的
要药。李时珍综观“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意识到“本
草诸药,亦不可以今之不识,便废弃不用,安知异时
不为要药如香附者乎?”据此,他编写《本草纲目》时,
取材“不厌详悉”,“虽冷僻不可遗也”,从而使《本草
纲目》成为古代药物资料的渊薮。

现代中药研究同样应该注意了解药物兴衰史,这
是发展中药事业的需要。本文试析中医用药的类群、
品种、药用部位、药效等方面的兴衰现象,以阐明它
与现代中药研究的密切关系。

一、中医用药类群的兴衰

药物的兴衰,自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本身的疗
效,但又不尽然。由于科学水平、社会风尚、文化背
景,尤其是用药思想的不同,不同时代所使用的中药
类群也有所不同。先秦医方(见《五十二病方》等)书中
所用的死者掇、女子布、蔽褐、久溺中泥等,是一类
原始用药思想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很自然
地被淘汰了。唐以前医方中,热性药(如蜀椒、乌喙、
桂、吴茱萸等)使用较多,主要是人们对寒邪致病
的认识比较深刻。宋代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和社会风
尚的影响,导致了香药和食药畸形发展。此后金元火
热派、滋阴派的兴起,使寒凉药的运用逐渐增多。逮
至清代温病学派崛起,多数医家便视温热药为畏忌。
他们不仅治热病用凉药,即便治内伤,也多选择平和
淡柔润之品(如沙参、玉竹、玫瑰花、玳玳花等)。这
种风气不单是学术观点影响,也和医生开业要加大保
险系数有关。因此,某一时期被冷落的药物并不全是
无用之品。一部分药性峻烈(甚至有毒)的药物很有发
掘的必要(如雷公藤之类)。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条
件,寻求最佳剂量或炮制方法,使之安全有效。听任

用药惟务平和之风蔓延,必将把中医药疗效的优势销
蚀过半。目前中药实验研究大体是围绕着常用中药转,
但从长远来看,还应该把研究“冷宫”里的中药摆进议
事日程,以求获得新的发现。

在中医用药史上,早期金石药使用频率比现在高
得多。金石药(包括无机盐类)的消退原因是多样的,
在旧时代这种消退甚至还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是,
当现代发现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之后,许多矿
物药也许会以新的用药方式再度兴起。与此相反的是,
一度盛行的“血肉有情之品”却在现代遇到了新问题。
动物药里有一些来源于在当今世界受保护的生灵,如
犀角、虎骨、熊胆、羚羊角等,尽管它们是名贵药材,
但现实决定了它们必将暂时隐退。药物类群的资源无
情地决定了某些药物命运的浮沉。在人们超乎寻常地
迷恋某一药物并不顾一切狂采滥用的同时,也就决定
了该药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命运。野山参就是最佳例证。

现在中医生习惯用什么药,和他所受教育有关。
经典医著(《伤寒论》等)、中药普及读书(《本草备要》、
《药性赋》等)以及现代中药教材中的药物一般为大家
熟知。但是,这些书籍的编撰者选材时都要受其个人
用药实际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必须认识到,在这些
书籍之外,还有一部分有效药物值得深入发掘。提高
· 用药者的学术素质,增进其知识的深度广度,也是发
展中药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中药品种的兴衰

历史上某一名称下的药物品种并不都是单一的、
固定不变的。一般说来,疗效较好的,或产量大容易
获得的品种会后来居上;但也有各种原因造成的以伪
充真、同名异物现象。唐宋时酸橙(*Citrus aurantium*)、
香圆(*C. wilsonii*)之类取代了同科植物枸橘(*Poncirus
trifoliata*)充当枳实的局面,这是合乎一般药物发
展规律的。我们无须因为枸橘是正宗而复古,但也可以
考虑开发这冷落已久的老药药源,使之物尽其用。人
参与党参则不然,以党参代人参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权
宜之计。研究和用含人参的古方必须注意这一历史
用药实际,不可将党参与人参等同。即便如此,含人
参的古方在现代用起来也未必符合当时的要求,因为

古方人参用的是野山参, 现已濒临绝迹了。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古方时, 注意用品种的差别。

除了弄清一些名近实异的中药品种之外, 还应该了解各品种出现的时代, 否则将影响临床和实验用品品种的正确性。例如“十八反”研究应该知道该说法最初形成时所依据的品种。可是, 现在许多人都误将党参、太子参、北沙参、西洋参作为反藜芦药。他们不了解“十八反”产生之后一千多年, 上述诸“参”才陆续问世。大戟也是这样, 它在“十八反”形成时用的是京大戟(*Euphorbia pekinensis*), 毒性较大。现在多用的是不同科的红大戟(*Knoxia valerianoides*)。有人用红大戟作原料去验证“十八反”, 这等于无的放矢。

三、中药药用部位的兴衰

同种药物的不同药用部位也有兴衰变化。例如枸杞子首先用的是果实, 后来其根皮也发展成为一味新药(地骨皮)。有时后来者反而居上, 例如大青, 最早是用其叶, 后来大青品种越来越复杂, 有些品种的根(板蓝根)竟比大青叶更为常用。当然, 总的说来, 药用部位扩大是一件好事, 象罂粟那样的例子是极个别的, 我国唐代就用罂粟(种子)煮粥喝。北宋末学会了用罂粟壳治病, 虽说也有损害, 但并不为祸。明代知道了鸦片制法, 但仅用于治病。至清代英、美商人向我国倾销鸦片之后, 鸦片就成为毒品。现鸦片在我国禁绝了, 连带罂粟、罂粟壳也少有人问津——这是比较特殊的物极必反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 也有一部分药物的药用部位萎缩了, 而且是不合理的萎缩。例如五加皮, 《名医别录》指明其茎皮、根皮同用, 但后来渐渐变为全用根皮。笔者曾考得宋以前龟甲是上下甲同用的, 元代以后龟板(下甲)才盛行(《中医杂志》, 1982年第3期)。或以为下甲是阴中之阴, 但是, 与龟甲功效相近的鳖甲为什么又用上甲呢? 须知后世附会的一些理论解释往往掩盖早期质朴的用药经验, 由此造成了龟上甲大量地被废弃。针对这些现象予以研究, 必将为扩大药源提供依据。最近, 《龟上下甲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课题证实古代上下甲同用是正确的。该课题在药史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实验研究, 已获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龟上甲已作为一味新药收入药典。

四、中药药效的兴衰

中药药效的兴衰和药用部位一样, 对于某些药物来说, 新的药效出现总是占多数, 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例如忍冬, 南北朝以前不过用来酿酒, 有“补虚疗风”之效。宋以后, 忍冬藤用于清热解毒良效,

它的花(金银花)在明清已成为清热解毒要药大行于世。象这样的例子甚多, 但是, 对于中药研究来说, 更有意义的是注意那些莫名其妙、阴差阳错地衰落下去的药效, 把它们发掘出来, 丰富临床用药内容。这方面的出色例证是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掘, 它使得一千多年前青蒿绞汁治疟疾的经验得到证实和提高。五加皮也是如此, 它在早期古典药学著作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补气益精作用, 甚至有“宁得一把五加, 不用金玉满车”的夸张之语。但到明清之时, 五加皮的主要功效却成了散风胜湿。该药有无直接补益作用呢? 现代药理研究者经实验证实了它确可补益, 临床上又开始发挥五加补益功效的作用。龟甲也是如此, 宋以前它曾是知名的骨折科用药, 以至于有“昔有伤折, 宜用生龟”的民谚。但元代以后它的滋阴作用兴盛, 反而掩盖了它祛瘀止痛的良效。现代药理研究已初步证实龟甲可以止痛。

当然, 不可否认, 许多药物效果的衰落, 不是人为的失误, 而是长期用药实践经验证实其疗效不确的结果。早期药书若干药物的效果, 有一部分是方士们的说法。例如朴消, 方士用它炼饵服食, 说是可“轻身神仙”, 李时珍批评说: “盖方士率人之言”。又如地榆, 一度也是方士推崇的补脑药, 甚至有“宁得一斤地榆, 不用明月宝珠”之说。事实证明地榆并无此神效。翻开《神农本草经》, 可知该书上的许多药(云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防葵、杳实……), 现已衰落,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疗效不佳而被自然而然地淘汰。类似的药物数以百计, 这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药物发展史上的许多例子还表明, 某些药效时兴起来, 并非都是经过医疗实践检验的。走红的药物, 可以是因徇名, 也可以是因讹传讹而受人青睐。象追求长生者一度捧上了天的甘露、秋石、红铅等, 最终还是衰败了。那么, 当今走红运的药物中有无药效掺水分的宣传呢? 象供不应求的冬虫夏草、天麻之类, 其疗效和价值是否相配呢? 值得我们用科学的态度予以研究。我们既要查验古代所载某些药效的失实处, 也要防止继续产生新的传奇不实的药效。鸡血疗法的昙花一现, 说明现代也可能出现“吹捧”起来的药效。

以上介绍了中医用药兴衰的几个方面。这几方面有时又互相影响。例如中药秦皮, 汉代曾是眼科良药, 随着品种混淆现象的出现, 秦皮治眼疗效也就跟着衰落了。只要找出问题的症结, 再在秦皮治眼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因此, 了解药物兴衰史, 对当今中药科研,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